

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基于《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朱桂生 黄建滨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6.17.011

摘要 本文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作为分析对象,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探讨了美国主流媒体如何建构中国的“一带一路”形象,建构了怎样的“一带一路”形象以及这些形象建构的背后存在怎样的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研究发现,《华盛顿邮报》通过分类、及物性、文本架构、互文性等手段,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塑造成一种殖民扩张、重利轻义的霸权形象。这种形象塑造的背后与美国社会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密切相关。

关键词 “一带一路”;华盛顿邮报;批评性话语分析;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G219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朱桂生,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浙江杭州310023。黄建滨,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310013;浙江科技学院特聘教授,浙江杭州310023

一、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两大构想被简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横跨亚欧非大陆,在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基础上,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进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①。“一带一路”战略一经提出,便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国内外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并热烈探讨其内涵:支持者赞其为“动力”和“机遇”^②,而反对者却诬其为“挑衅”和“威胁”^③。

那么,当今世界最具有强话语权的美国主流媒体^[1]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呢?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尚未对此展开实证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美国《华盛顿邮报》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近三年来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关报道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以揭示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观点和看法。《华盛顿邮报》地处美国首都,对美国的精

英阶层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是美国最具权威性的报纸之一^[2],因此,将该报作为载体,是我们研究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态度的最好选择之一。研究过程中,笔者以“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和“NEW SILK ROAD”作为关键词,通过《华盛顿邮报》的官方检索平台,收集其近三年来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自建语料库,并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对“一带一路”的相关话语进行研究,以此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美国的主流媒体建构了怎样的“一带一路”形象? 2.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构起这种形象的? 3.这种形象建构基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本文将利用FAIRCLOUGH(费尔克劳)的三维分析框架,解构《华盛顿邮报》中涉及“一带一路”相关报道的文本特征和架构特点,探究其建构的“一带一路”形象,进而剖析呈现此种现象的深层缘由。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及FAIRCLOUGH的三维框架理论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CDA)是一种从语言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社会分析的方法,其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主义。1979年,FOWLER和HODGE等人在其著作《语言与控制》中首次提出了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奠定了基础^[3]。他们认为,语言不仅反映着社会,同时也建构着社会。以此为出发点,FAIRCLOUGH^[4]在其著作《语言和权力》一书中明确提出了CDA这一研究范式。CDA认为,语言并非一种公正客观的交际媒介,其中总是充盈着社会的、政治的或种族的意义^[5],但表现形式却很微妙,让人觉得理所当然。因此,CDA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尤其重视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不公正、不平等、权力关系等在实施、隐藏、自然化、合法化、再生产时的话语过程^[6]。另外,CDA不仅能够对已经自然化的不公正、不平等、权势及权势斗争去神秘化^[7],更重要的是CDA还可以揭露话语在建构和维护这些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权势过程中所起的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8]。

在CDA领域,研究者们探究话语时虽遵循着

一些基本的原则,但使用的方法却不尽相同。目前学术界最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四种:FOWLER^[9]的批评语言学,FAIRCLOUGH^[10]的社会文化分析法,VAN DIJK^[11]的社会认知分析法以及WODAK^[12]的语篇-历史法。此四种方法虽各有侧重,但学术界公认FAIRCLOUGH的社会文化分析法在整个CDA领域最系统最完善。社会文化分析法认为,语言的使用实则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而所有的社会实践都会受制于社会以及社会文化语境,因此,话语或任何一个话语实践都应该是一个包含语言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三维框架统一体。基于此,FAIRCLOUGH提出,批评性话语分析应该遵循三个步骤:描述(DESCRIPTION)——阐释(INTERPRETATION)——解释(EXPLANATION),即描述文本的各种语言形式特征,阐释文本的生成过程,解释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13]

鉴于FAIRCLOUGH三维框架理论的系统性和本研究目的的契合性,本文将依托此理论对《华盛顿邮报》中“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作如下探讨:在文本层面,从分类、及物性、文本架构等描述其语言特征;在话语实践层面,从互文性分析阐释文本的生成过程;在社会实践层面,结合当前的国际权力、社会文化关系等对文本进行解释。

三、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三维框架分析

(一)文本分析

FAIRCLOUGH^[14]认为,文本分析可从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等方面展开,其具体过程可涉及分类、暗喻、及物性、主被动语态、情态、文本结构以及衔接手段等内容。当然,对文本的分析并非需要囊括前述所有层面,因为不同的文本有可能在某些语言特征方面较为突出,而在其他特征上并不明显^[15]。有鉴于此,本文将选定《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中较为典型的语言特征如分类、及物性以及文本架构等作为文本分析的主要内容。

1. 分类。分类是一种体现语言概念功能的重要手段,亦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它通过语言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和归类,从而赋予外部

世界以秩序。语篇的分类系统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16],但是,语言并非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因为受认知水平和思想情感的影响,人们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过程并不总是客观和真实的。就语言系统的词汇层面而言,同一词汇经常有多重意义,而同一意义亦可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可以说,文本的建构过程其实是一个词汇选择的过程,而词汇的选择必定受一定的社会语境、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影响和争夺。辛斌^[17]认为,通过词汇的选择给事物分类是大众媒体惯用的手法,亦是创造歧视的主要途径。因此,对文本词汇选择策略的探讨能够有效揭示文本生产者的态度立场和意识形态。

在《华盛顿邮报》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中,笔者发现,一个典型的通过词汇选择策略来进行分类的方法即是过分词化(OVERLEXICALIZATION)。在CDA中,过分词化通常表现为相同/相近词汇的密集出现,以此来描述同一事物,其目的在于强调和突显被修饰客体的某些特征,进而引发广泛的关注。过分词化往往体现着文本生产者强烈的主观意识。通过检索自建的语料库,笔者发现在《华盛顿邮报》中,作为被修饰客体,“一带一路”被一些带有明显消极语义韵且意义相近的修饰词“威胁(THREAT)”、“紧张(TENSION)”、“挑战(CHALLENGE)”、“控制(CONTROL)”、“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等重重包围。这种密集且重复出现的修饰词把“一带一路”塑造成了这样一种形象:“一带一路”的实施,对内在于“死死控制(STRANDING CONTROL)”新疆,对外则为了与周边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建立“军事同盟(MILITARY TIES)”和进行殖民扩张(“THE MARSHALL PLAN”),其结果损害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度、越南)的紧张。《华盛顿邮报》虽然也用有了一些积极词汇对“一带一路”进行描述,如“商业机遇(BUSINESS OPPORTUNITY)”、“互惠互利(MUTUAL BENEFIT)”等,但具有压倒性多数的消极语义韵词汇对“一带一路”的过度修饰,仍然暴露出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刻意歪曲、刻意丑化、污名化的态度^[18],其

冷战思维和“中国威胁论”心态昭然若揭。

2. 及物性。功能语法认为,及物性是再现现实世界的语义系统,其作用是把人们主客观世界中的各种行为区分成若干过程(物质、心理、关系、行为、语言、存在等六种),并指明各种过程中的参与者和情景成分。FAIRCLOUGH^[19]认为,在同一语篇中,对某一事件的描述可采用不同的过程组合,但选择哪类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国内学者熊伟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现实世界的同一事件除可用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建构外,还可改变参与者的位置,即变换主动或被动语态的形式来再现,但主动或被动语态的选择受文本意识形态的影响^[20]。因此,对文本中及物性,尤其是对语态及事件过程性质的探讨对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自建的语料库,笔者发现,《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一带一路”及相关事件时,经常将其作为施动者且置于句首,并采用侧重客观存在的物质过程进行描述。(表1)

表1 “一带一路”相关报道的施动者及过程性质

施动者	事件描述	过程类型
1.北京雄心勃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引起了俄罗斯的恐慌…	物质过程
2.中国农民	将毒害我们的土地…	物质过程
3.(中国修建的)大坝	将导致柬埔寨大面积范围内的贫苦…	物质过程
4.(中国人的)工程	导致了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	物质过程
5.中国	用钱和压力迫使这个地区的人就范…	物质过程
6.中国	潜入了俄罗斯的后院…	物质过程

此类例子在《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中频繁出现,限于篇幅,笔者无法一一列举。相关研究表明,句子的起始单词或短语具有认知显著性,极易激活读者头脑中的施动——受动认知图式,从而有意识地将事件归因于特定群体。^[21]《华盛顿邮报》如此安排过程参与者“一带一路”在句中的位置,并用物质过程进行描述,其目的在于凸显“一带一路”在造成一系列“负面后果”,如沿线国家土地被污染、民众流离失所等事件中的主导作用,并向受众强化这些“负面后果”都是真实的、客观的,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一带一路”战略。

3. 文本架构。文本架构是文本生产者组织和呈现文本的一种方式,体现了文本生产者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通过文本架构,文本生产者能够容易地使某些信息得以前景化或被重视,而另一些信息则被背景化或被忽视。考察文本中信息的前景化或背景化是CDA揭露文本生产者意识形态的一种有效方法。

为此,本文将对华盛顿邮报2015年10月24日发表的一篇题为“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SEA: A CHINESE VISION, A PAKISTANI CORRIDOR”的文章进行分析。据该文报道,中国政府投资大量的资金为中巴经济走廊中的哈尔和林高速公路(KARAKORUM HIGHWAY)进行了改造和升级。但令人气愤的是,此篇文章对该项工程投资的巨大,工程的困难程度以及公路升级后对巴基斯坦当地居民带来的便利等信息着墨甚少甚至直接忽略。相反,该文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哈尔和林高速路周边居民对交通和污染的担心以及对该条公路能否产生利好的质疑。如:“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面临环境问题(THERE WILL BE A LOT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NEAR FUTURE.)”、“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摆脱这种困境,以后我们的孩子能捡到的东西只会是从卡车上掉落的垃圾而已(AND IF WE DON'T GET ANYTHING OUT OF IT, OUR KIDS WILL JUST BE COLLECTING THE GARBAGE AND RUBBISH FROM THE TRUCKS.)”等^④。

在此篇报道中,被前景化的信息是因“一带一路”战略而升级的高速公路给当地的居民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以及巴基斯坦能否获益于“一带一路”的质疑。相反,中国政府的巨大资金投入、中国工人巨大的劳动付出以及公路升级后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巨大生活便利等信息则被背景化了。因此,通过这样一篇报道,受众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沿线参与国家不但不能从“一带一路”中获益,相反,还将陷入巨大的环境困境。

(二) 话语实践分析

FAIRCLOUGH^[22]认为,话语实践涉及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因此,CDA的话语实践维度是对话语生产和理解过程的阐释。下面,本

文将探讨美国的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是如何通过互文性策略在话语生产过程中传递意识形态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JULIA KRISTEVA^[23]提出,它描述了这样一种语言现象,即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改造。互文性是新闻话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因为大部分新闻报道并不是建立在新闻记者直接目击或亲临现场的基础上,而是源自各种不同渠道以及不同类型信息的引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报道呈现给受众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世界,而是由包含不同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话语建构而成的虚拟世界。正是由于互文性体现着文本生产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此,对文本的互文性进行分析逐渐成为CDA的一个重要手段。引语是互文性的一个典型特征^[24],因此,对引语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明晰《华盛顿邮报》在有关“一带一路”话语生产过程中所持的立场和意识形态。本文将从引语的两个基本层面,即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展开探讨。

1. 直接引语。直接引语直接转述当事人立场和观点,其目的在于增强文本的真实感,显示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直接引语的选择受文本生产者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影响,可以说,直接引语是一种间接的意识形态表达^[25]。笔者仔细阅读了《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发现其对“一带一路”战略于周边国家的“负面影响”大多采取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如下例:

例1.UTA KHAMI说到:“没有大鱼了,我们再也无法从渔业中赚到钱了。”(“THERE ARE NO MORE BIG FISH: WE CAN'T MAKE ANY MONEY FROM FISHING ANY MORE,” SAID UTA KHAMI..)^⑤

例2.ALEXANDER GABUYEV说道:“中国宣布它在哈萨克斯坦的丝绸之路计划后,俄罗斯的领导层感到恐慌和质疑。”(“WHEN CHINA ANNOUNCED ITS SILK ROAD PLAN IN KAZAKHSTAN, IT WAS MET WITH A LOT OF SKEPTICISM AND EVEN FEAR BY THE RUSSIAN LEADERSHIP,” SAID ALEXANDER GABUYEV.)^⑥

此类用直接引语呈现“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的例子在《华盛顿邮报》中不胜枚举,其意图耐人寻味。其目的当然是让受众相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重利轻义,已经引起了俄罗斯的恐慌,恶化了巴基斯坦的环境,损害了越南渔民的利益,而他们的报道不过是直接引用,因此是真实可信、不偏不倚的。除此之外,有些直接引语的呈现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直接对“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国政府的形象进行了故意抹黑,如:

例3.其中一个学者说道:“好的话,新的丝绸之路将给新疆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IF DONE WELL, THE SILK ROAD COULD HAVE A HUGE IMPACT ON XINJIANG AND BRING REAL DEVELOPMENT MOMENTUM,” SAID ONE OF THOSE SCHOLARS.)^⑦

这段话似乎是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评价,但话语的生产者又在后面的叙述中不断地提醒受众,该引语的发出者“学者(SCHOLAR)”是匿名的(ANONYMITY),而其匿名的原因是“害怕受到惩处(FEARFUL OF INVITING PUNISHMENT)”。这样的引语呈现无非是诱导受众去作恶意地揣测:其一,该学者所做的积极评价可能是违心的、不真实的;其二,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报道管控严厉,民众对其没有评判的自由。

2. 间接引语。从所收集的语料中笔者发现,在《华盛顿邮报》对“一带一路”所作的相关报道中,采访对象涉及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越南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也不乏一些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溢美之词,但令人遗憾的是,多数积极正面的评价均以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显然,其目的就在于模糊信息的来源,降低事件的真实性^[26]。

另外,《华盛顿邮报》还运用一些间接引语人为地影响和调整受众对直接引语的看法。如前文所提及的报道“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SEA: A CHINESE VISION, A PAKISTANI CORRIDOR”中有这样一则采访:

例4.RAMAZAN ALI说:“中国人能做一切,所有的事情都使当地人受益。”(“THE CHINESE

CAN DO ANYTHING,” RAMAZAN ALI,32, SAID…“EVERYTHING THEY DEVELOP BENEFITS THE PEOPLE.”)^⑧

按照正常的逻辑编排,例4中的直接引语已经清楚表明这名巴基斯坦人的观点,即“一带一路”已经惠及了当地的百姓。但奇怪的是,话语生产者随后却加了一句来自一些巴基斯坦经济学家的间接引语“巴基斯坦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国家不会从这次机会中全面获益”(PAKISTANI ECONOMISTS DISAGREE AS TO WHETHER THEIR COUNTRY CAN FULLY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⑨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明显就是为了诱导受众去质疑“一带一路”战略对巴基斯坦的贡献和作用,从而达到诋毁“一带一路”的目的。

(三)社会实践分析

前文进行的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分析均是为社会实践分析服务的。在CDA中,社会实践分析的主要内容意识形态分析^[27]。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且复杂的概念,在CDA中,指的是社会群体共享的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种信仰和价值观^[28]。从对“一带一路”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分析中不难发现,《华盛顿邮报》在总体上呈现出美国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即中国威胁论和冷战思维。美国主流媒体将“一带一路”战略刻意扭曲为一种重利轻义的“威胁”或“扩张”形象。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二:

首先,是从美国的立场出发,服务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大众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在美国,媒体对国际新闻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29]。当然,《华盛顿邮报》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报道也不例外。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是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而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深化其与亚太相关国家和地区合作关系的一种机制。中国的“一带一路”从覆盖区域上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有一定的重合,在经济合作领域,尤其是对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一定的冲击,这势必引起美国利用其强大的话语权对中

国的“一带一路”指手划脚,诬其为“扩张”和“威胁”,人为制造沿线国家的恐惧和质疑,从而达到阻碍“一带一路”战略前行的目的。

其次,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长期的误读。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对立面而长期存在,对于西方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因此,中国以及中国的相关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西方媒体的攻击和误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优越感的国家,很多美国民众认为其全球霸主的地位是天赋的,不可替代的,任何否定或挑战其主导地位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30]。因此,作为中国和平崛起助推器的“一带一路”战略势必会被其视为“威胁”和“挑衅”,而遭其主流媒体的恶意抹黑和污名化。

四、结语

依托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框架,本文探讨了美国主流媒体中有关“一带一路”报道的分类、及物性、文本架构、互文性和意识形态等因素。通过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自下而上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在美国主流媒体的眼中,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更多的是充满了新殖民主义色彩,其目的在于势力范围的扩张和自然资源的攫取,其结果是有失道德的:一方面,恶化了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漠视了沿线国家普通民众的生存权益。

2.美国的主流媒体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为“挑衅”和“扩张”主要源于美国社会的冷战思维和中国威胁论心态。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塑造成一种热衷扩张,重利轻义的“霸权”形象,其意图不外乎是为了引发沿线国家的普遍质疑,削弱沿线国家的参与热情,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媒介传播权力依然是不平衡、不平等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依然掌控者主导性的话语权,并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继续生产着针对他国或他国政策的偏见性话语^[31]。本文对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作批评

性话语分析,其目的就在于引导受众对此类文本进行批判性和解构性阅读,认清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歪曲、偏见、假象和意识形态,从而帮助受众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有一个全面且正确的认识。总之,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话语建构,还将继续提醒受众对其相关报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认识。当然,这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时代赋予中国语言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任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31200/DOCUMENT/1415297/1415297.HTM](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31200/DOCUMENT/1415297/1415297.HTM)

②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5-03/27/CONTENT_19925552.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5-03/27/CONTENT_19925552.HTM)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均来自[HTTP://WWW.WASHINGTONPOST.COM](http://www.washingtonpost.com)。

参考文献

- [1][2]端木义万. 美国传媒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3]FOWLER, R. ET. AL. LANGUAGE AND CONTROL[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 [4]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M]. LONDON/NEW YORK:LONGMAN, 1989.
- [5]辛斌,高小丽. 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4):1-5.
- [6][15][20][31]熊伟. 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 [7]LAZAR, M. M. EQUALISING GENDER RELATIONS:A CASE STUDY OF DOUBLE TALK[J]. DISCOURSE & SOCIETY, 1993, 4(4):443-465.
- [8]丁建新,廖益清. 批评语言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 [9]FOWLER, 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1991.
- [10][13][14][19][22]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2.
- [11]VAN DIJK, T.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12]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A]. IN R. WODAK&M. MEYER(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2001.

[16]HALLIDAY, M. A. K.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ARNOLD, 1985.

[17]辛斌. 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8]黄俊,董小玉.“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2):121-127.

[21]O'HALLORAN, 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LANGUAGE COGNITION[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23]KRISTEVA, JULIA. THE KRISTEVA READER[M].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6.

[24]付小秋,沈红. 叛徒还是英雄?——从批评话语分析看《南华早报》和《福克斯新闻网》在“斯诺登泄密事件”上的较量[J]. 山东外语教学,2014(4):47-53.

[25][27]洪亚星,董小玉. 被仰视的中国:从文本建构到形象塑造——基于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批评话语分析[J]. 新闻界,2015(13):24-29.

[26]樊茜茜. 批评语言学视角下的中美主流媒体新闻语篇对比分析——以MH17事件为例[D]. 郑州:郑州大学,2015.

[28]王泽霞,杨忠. 费尔克劳话语三维模式解读与思考[J]. 外语研究,2008(3):9-13.

[29]谢庚全. 美国主流媒体对我国南海政策的误读分析——以《华盛顿邮报》为例[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3(4):23-28.

[30]罗赛蒂.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接第30页)

播生态的另一种解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2).

[4]张曙光.浅析商品符号意义的社会建构——兼评麦克拉肯的文化意义流动模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12).

[5]李春雷,范帆.网络舆论中“暴力心态”的规避路径研究——以“男子棒打流浪狗遭人肉搜索”事件为例[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5(6).

[7]朱清河.场域理论视野下弱势群体媒介势弱的形成及其救助[J].新闻大学,2010(1).

[8]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27.

[9]李春雷,张楚越.群体性事件中新媒体对群体非理性心理的引导路[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4(10).

[10]许鑫.传媒公共性:概念的应用和解析[J].国际新闻界,2011(5).

[11](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52.

[12]陈勤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3]李春雷,凌国卿.风险再造:新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框架分析[J].新闻界,2013(13).

[14]赵云泽,韩梦霖.从技术到政治: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特性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3(11).